

《论语》的内省之“思”与马克思主义实践之“思”的契合性研究

王明贤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青岛 266520

DOI:10.61369/SDR.2026010009

摘要 : 《论语》中的“思”以道德内省为核心, 强调个体通过“学思结合”“反求诸己”实现人格完善;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则主张以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变革为路径, 推动人类解放。本文通过分析二者对“思”与“行”关系的不同定位, 揭示儒家“内省之思”与马克思主义“实践之思”在个体道德自觉与社会历史动力问题上的深刻张力, 并探讨二者在当代价值建构中的互补可能。

关键词 : 思; 认识论; 实践观; 儒家

A Study on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introspective "thinking"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the "Thinking" in Marxist practice

Wang Mingxian

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20

Abstract : The "thinking"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centers on moral self-examination, emphasizing that individuals achieve personality perfection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learning and thinking" and "self-reflection". The Marxist view of practice advocates promoting human liberation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 This article, by analyzing the different position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ing" and "acting" by the two, reveals the profound tension between the "introspective thinking"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practical thinking" of Marxism on the issue of individual moral self-awareness and social historical dynamics, and explores the complementary possibilities of the two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values.

Keywords : thought; epistemology; view of practice; Confucianism

在中国早期文化中, “思”最初与“心”直接相关, 古人认为“心”是思考的器官, 因此“思”的核心义为“用心思考”。儒家的内省之“思”指向的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

在马克思主义中, “思”指的是人的意识, 与实践相联系,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内容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1]。认识源于实践, 又高于实践, 最终服务于“改变世界”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认识世界仅是起点, 绝不能止步于此, 更为根本的使命在于改变世界, 这就要求我们把认识与实践相结合, 将认识的成果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具体行动。

在儒家思想中,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一是皆以修身为本”^[3]。儒家思想以“修身养性治国齐家平天下”为价值脉络, 将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视为构建理想世界的根本前提。而在马克思眼里, 物质对意识具有决定作用, 唯有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 使社会物质财富实现极大丰富, 才能彻底打破旧有生产关系的桎梏, 进而实现人类的解放。

一、《论语》中的“内省之思”：道德主体的自我建构

在儒家思想中, “思”蕴含着丰富内涵。从认知路径来看, 强调学思互济; 在道德修养层面, “思”表现为反省自身; 于实践维度, “九思”将“思”贯穿于视、听、言、行等行为全程。从认知路径, 到道德修养, 再到实践维度, 这些层面相互交融, 共同构

建起儒家道德主体的完整自我塑造体系。

(一) “思”的理论化内涵

学思互济的认知路径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4], 从王阳明“格竹”失败到晚明士人空谈心性而误国, 均印证了“思而不学则殆”的儒家告诫。儒家认为, 脱离经典学习的“思”会导向空想与危机, 因此必须将思考建立在扎实求学的基础上。

反身自省的道德工夫

在儒家看来，“思”在于自我反省，正如《论语》所言：“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6]，儒家之道，以人为鉴：见贤思齐，破情性而生进取心；见不贤内省，戒恶行而促德性升。其要义在于打破自我封闭，向内深耕，借外部万缘，成自身完善。

“九思”的实践指向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6]，思字贯穿君子的全部实践过程，这种单纯聚焦于自身的过程，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不足，仅仅通过个人内省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过于理想主义。孔子对人的情性认知欠缺，因而其所言的“君子”在那个年代没有市场。

（二）修身的封闭性和社会局限性

春秋时期，铁犁牛耕尚未普及，井田制下的集体劳作效率低下，普通百姓终日困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生活，识字读书是贵族阶层的特权。而孔子倡导的“君子之道”，要求习六艺、明五经，这不是平民百姓能负担的起的。试想，当一位老农在田间忙碌，如果有“君子”上前宣讲“仁义礼智信”，恐怕只能换来一句“莫误农时”；再退一步讲，在那个年代“君子”大概率不会去田间地头，更遑论与老农交谈，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现实，这正是彼时儒家思想难以向贫苦大众阐释的真实原因。

子路的故事揭示了儒家教化的困境。这位市井游侠，若不是孔子以“礼”为剑、以“道”为盾，凭借过人的学识与武力的震慑，恐怕难以收服其心性。这也暴露出“君子”标准的模糊性：当“仁义礼智信”缺乏客观的衡量标尺，仅凭个人对《诗》《书》《礼》《乐》《春秋》的理解与内心的自律，极易陷入“公说公有理”的桎梏。在礼法崩坏的时代，依靠道德自律维系社会秩序终究是理想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之思”：社会存在的革命性改造

马克思主义的“思”是向外改造世界的行动纲领，其道德意义在革命实践中生成。“思”的内容与形式由物质生产活动决定，不是脱离现实的纯粹内省结果。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在农耕时代，人们对风调雨顺的祈求催生了二十四节气。农民据此掌握农时，辛勤耕作，以追求更好的收成。工业革命中，蒸汽机与工厂制彻底革新了生产方式，这一物质巨变进而推动了社会思想的全面革新。进入自媒体时代，手机屏幕成为新“生产工具”。“流量至上”的观念改变了部分人的思维方式，使其放弃脚踏实地，转而追求曝光与一夜暴富。从锄头到机床再到手机屏幕，主要的生产方式在变化，人们的意识也跟着变化。

（二）革命的实践：解放的必由之路

社会的变革需要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完成，而个体道德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重塑。“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7]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耕国家，小农意识扎根于每个社会阶层。无论是农民、商人，文人、官员，“小富即安”的处世哲学代代相

传。只要还能吃饱饭，百姓则“安于现状”，这构成了中国社会传统的个体道德底色一温良。但是，中国人民有其独有的血性，每当封建统治的压迫致使百姓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孔子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伦理秩序不复存在。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黄巢“冲天香阵透长安”的壮志，李自成“均田免赋”的号召，一次次印证当最起码的生存权力不复存在，被压迫的广大民众便会打破旧有的道德桎梏，以革命的方式重塑社会秩序，而新王朝建立后，社会则会回归“小富即安”。

从“温良”到“革命”再到“温良”，个体道德在中国封建王朝更替中一次次循环。这种循环不是对传统道德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统治压迫下，贫苦大众为拯救自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这也印证了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解放，而个体价值观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被重塑。

三、内省与实践的辩证冲突

《论语》的内省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虽路径迥异，却价值互补：内省能防止实践异化，实践能避免内省空谈。二者的融合，旨在将传统修身智慧转化为构建现代正义制度的伦理资源。

（一）道德动力源的分歧

在儒家思想中，“道德自觉”是人的行为核心。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8]，意思是只要人心向善，就能提升道德的境界。这说明，人主动行善，才是成为有德之人的关键。道德完善在于“克己复礼”。“克己”就是控制自己的欲望，三省自身，莫让冲动影响行为。“复礼”就是让自身行为符合“礼”的要求。“礼”源于周朝，规定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克己”和“复礼”辩证统一，“克己”使人发自内心行善，“复礼”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克己复礼”最终是为了实现“以和为贵”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靠法律强制，而是靠每个人自觉守德。每个人将“礼”牢记于心，主动遵循礼制，个人完善自身，社会方能迈向大同。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这种“道德自觉”完全不同。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并非将历史发展归因于人们的道德提升，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物质力量矛盾运动的结果。这样一来，像《论语》所言的靠个人“克己”反省来提升道德，在马克思主义这里就行不通了。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进行暴力革命。只有通过革命，改变旧的社会秩序，才能打破旧生产关系的束缚。马克思主义理想中的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这并不意味着在原来的社会秩序上修修补补，而是要彻底消灭阶级。在生产力发展到高度发达的程度，社会物质变得极大丰富，人类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全新的人类社会才会出现。

可以看出，两者在动力来源、实践方法和社会理想上完全不同。儒家靠个人内心的道德自觉追求社会和谐，马克思主义则强调物质力量的矛盾，主张通过集体的革命来改变社会。

（二）实践中的道德主体重建

《论语》的修身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来源的哲学基础不同。不过在人们追求理想社会的过程中，这两种观念能够相互补充，因此关键就在于塑造一种新的道德实践方式，既讲道德自觉，又能切实推动社会变革。

“当群众戴上革命的假面时，旧社会的幽灵就会借尸还魂”。马克思指出，如集体行动没有道德约束，打着“改造世界”的旗号，最后可能变成无序的暴力。马克思批判“异化劳动”即此意：劳动本是人的价值的体现，结果却成了洪水猛兽。因此，《论语》提及的“克己复礼”提醒人们三思而后行，守住道德底线，不唯目的是从，而采取不道德的手段。否则革命的崇高理想，也会变成“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乡愿”则是一个鲜明的反例，指表面上守规矩，心里却不真诚的人。孔子批评“乡愿”，说他们是道德的敌人，这也说明，只在内心反省，不联系实际，亦不可行。

把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结合，“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9]”儒家强调的自我反省，是集体行动的道德准则。毛泽东指出“为人民服务”，彰显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也体现儒家“仁者爱人”的责任感。“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展现了崇高的个人道德修养，并落实到为人民谋福利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更形象地阐述了儒家“修己安人”思想。儒家“修己”，仅关注个人内心修养；历史唯物主义则阐明“修己”离不开建立公平的社会制度，“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才能真正实现“安人”。分配财富时，儒家讲“见得思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则是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出发，建立公平的分配制度，把“义”从一句道德口号，变成能落地的制度。

所以，这两种思想的互补不是简单拼在一起，而是在实际行中塑造新的道德方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可弥补儒家内省的空泛，而儒家的道德性能防止实践走向歧途。二者互补，方能使个人修养落到实处，真正造福社会。

四、重构“思”的辩证统一

内省与实践的统一，为个体生存、社会治理与文明发展提供了整合性道路。它指引个人超越“躺平”与盲动，推动社会构建涵养德性、消除异化的制度，并在文明对话中，使儒家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辅相成，共同引领人类走向更具意义与更加公正的未来。

（一）内省赋予生活意义，实践实现生命价值

儒家所言“吾日三省吾身”，强调每天都要自我反省，从而帮助我们找回生活的意义，促使我们去思考人生真正所求为何物。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0]，提醒人们别只盯

着眼前的苟且，而是要追求更高的精神价值。马克思主义指明了将这些价值变成现实的路径，即人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不能付诸空想，而是将反省所悟，作用于科技创新、社区建设等实践活动中，才能摆脱“躺平”的空虚，更不会在忙碌中迷失。

（二）德治与法治结合

治世不能只靠法律，也不能只靠道德。儒家有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制度需有教化作用。法治建设需有“知耻”的观念，才能使法律不只是机械化的规定，还能使人发自内心的遵守。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直指道德的物质根源。若财富分配不均，“足蒸暑土地，背灼炎天光”，却换得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就算提倡“见得思义”，也无人能做到。所以推进“共同富裕”尤为重要，完善分配方式，方有民德，方得民心。

（三）东方伦理与西方理性的融合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贫富差距扩大，资本对人的压迫日益加剧。人的存在受到了异化，资本把人当成可以计算的单位，招致生态破坏，伦理践踏。儒家讲“仁民爱物”“天人合一”，这些思想旗帜鲜明地反对了资本对人的异化，让科技发展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为改造社会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儒家的美好想法才能变成现实。

知行合一，才能实现完人。既非沉湎心性的空洞玄思，亦非迷失异化的“连轴转”。它要求我们贯通思维与行动，在社会治理中平衡道德与法治，在文明演进中融合伦理与科学。唯有如此，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既持守内心的“仁”之灯塔，又不失“改造世界”的实践勇气。

五、结语

《论语》的“内省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之思”，代表了人类文明中道德主体性建构与社会历史动力开发的两大路径。二者的张力揭示了“个体完善”与“集体解放”的深刻矛盾，而其对话则指向一种可能的整合：在变革世界的实践中升华道德，在自我反思中锚定实践的人本方向。唯有如此，“思”才能从书斋走向街头，从心性修炼升华为历史创造。

参考文献

- [1] 李琳.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视角下《论语》君子观思想的当代价值[J]. 现代交际, 2017, (19): 178-179.
- [2] 宋瑶瑶. 《论语》中以人为本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研究[D]. 兰州交通大学, 2023.
- [3] 陈晓芬、徐儒宗. 论语·大学·中庸[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250.
- [4] 陈晓芬、徐儒宗. 论语·大学·中庸[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21.
- [5] 陈晓芬、徐儒宗. 论语·大学·中庸[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45.
- [6] 陈晓芬、徐儒宗. 论语·大学·中庸[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203.
- [7] 焦志燕. 《论语》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及运用[D].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9.
- [8] 陈晓芬、徐儒宗. 论语·大学·中庸[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84.
- [9] 高连福. 孔子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及其会通[D]. 首都师范大学, 2011.
- [10] 陈晓芬、徐儒宗. 论语·大学·中庸[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80.